

【学术史研究】

海外藏档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掘、新视角、新路径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评析

张连红

【摘要】南京大学姜良芹教授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全40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全书凝练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20多个专题,为学术界开辟中国近现代史及抗日战争史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史料。这套丛书收录的档案史料种类丰富,编排得当,编纂体例适宜,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档案史料的原貌,为今后探索中外合编档案史料提供了有益参照。揆诸全书,其史料价值极高,既有利于学术界进一步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诸多新的领域,又有利于弥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薄弱乃至缺失环节,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意义重大。无论从史料编纂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套丛书都是近年来海外档案文献整理及出版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关键词】哈佛燕京图书馆;费吴生夫妇档案;中国近代史研究;档案史料汇编

【作者简介】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出处】《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南京),2023.3.130~139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发展体系之中,国际化因素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故而海外保存了大量有关近代中国的文书、书信、函电、日记、图书、口述史、影像等资料,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之一。因此,搜集、整理和出版海外有关近代中国的史料已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学术交流的频繁,国内学者对海外所藏有关近代中国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及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代表性成果有吴景平等主编的“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丛书全10册;陈红民、傅敏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全24册;张生主编的《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全10册;张生主编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全19册

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姜良芹教授于201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批有关近代中国的重要文献,经过整理,先后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全3册^①、《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解放区档案》全7册^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22年11月,姜良芹教授及其团队又整理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全40册^③(以下简称“《档案汇编》”),这是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结项成果之一,也是近年来海外有关近代中国档案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件幸事。

新发掘:费吴生夫妇档案开辟学术新课题

费吴生(George A. Fitch, 1883-1979),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George F. Fitch)之子,因出生于中

国苏州,故中文名为“费吴生”。杰拉尔丁·汤森(Geraldine Townsend, 1892-1976),系费吴生第二任夫人。费氏夫妇常年生活在中国,具有多重身份,既是社会活动家、作家,也是传教士。他亲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因此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记录者、观察者。这套《档案汇编》就是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夫妇档案为基础编纂而成。

全书分为“日本侵华编”“中美关系编”“社会团体编”和“个人文献编”四个部分。

第一编“日本侵华编”,共4册,分为“‘一·二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战时重庆”三个专题。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费吴生夫妇留居上海,并作为骨干,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扶轮社等组织对一·二八事变期间战争难民的援助工作。第1册主要分为三类:费吴生“一·二八”战时日记、费氏夫妇收藏的书信,包括费氏家族书信、费氏夫妇与编辑往来书信、费氏夫妇与友人往来书信等,以及相关剪报和文稿。1937年南京沦陷后,费吴生选择留在南京,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1938年1月,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冒着危险将相关资料和反映日军暴行的电影胶片带回美国,并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公之于世。第2、第3册为费吴生收藏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包括往来书信、日记、战后诉讼资料和剪报。第4册主题为“战时重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费吴生于1939-1942年生活在重庆,亲历了重庆大轰炸等事件,本册主要是费氏夫妇家信和手稿。

第二编为“中美关系编”,共16册。《档案汇编》“前言”介绍说:“费吴生夫妇作为长期定居中国的美国人,他们是二战前后中美关系演变的推动者与记录者。”^④这一时期,费吴生是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扶轮社、共济会、红十字会等诸多组织的重要人物,同时还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执行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军人服务团顾问等

职,一面致力于救护伤兵和平民的人道主义事业,一面积极争取美国对华援助。费吴生夫人此时返回美国,大力呼吁“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Japanese Aggression)、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等组织支援中国抗战。费氏夫妇在中美两国为中国抗战事业不停奔波。第5、第6、第7、第12、第13册即是费吴生这一重要经历的生动反映。其中第5、第6册主题为“反对美国中立与呼吁美国对日禁运”,主要包括往来书信、手稿和剪报,记录了费氏夫妇在全面抗战初期反对美国政府默许、纵容日本侵华,不断呼吁美国朝野援助中国。第7册主题为“战时美国民间援华”,收录了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美国教会对华救济会(Church Committee for China Relief)等组织的档案文献。第12、第13册主题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收录了与工合运动直接相关的工作报告、书信、“工合”英文报刊、评论文章、战时出版物等。

抗战胜利后,中国再度陷入国共内战。费吴生夫妇与他们的朋友周以德(Walter H. Judd)、亨利·卢斯(Henry Luce)、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等人加入美国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该组织是美国国内亲国民党政权、拥蒋反共、试图影响美国上下对华政策和态度的各组织的合称。此后,费氏夫妇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反对者。《资料汇编》第8、第9、第14、第15、第16册与这一经历密切相关。其中第8册主题是“战后美国院外援华集团”,收录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The America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相关文献,费氏夫妇手稿、书信,周以德相关资料,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Anti-Communist China)及其他文献。第9册主题为“战后美国有关亚

太局势与中国问题的文献”，收录了费氏夫妇在拥蒋反共立场下收藏的他人文章和评论。第14、第15册主题为“美国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文献”，收录了费吴生夫妇生前搜集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文献，以及他们撰写的文章。第16册主题为“抗战胜利前后的朝鲜局势”。1947年，费吴生前往朝鲜工作，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局势与中美两国关系十分密切，故有关档案文献收录在“中美关系编”中，主要有书信、剪报、文章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历史影像。

由于费吴生家族和个人履历关系，费氏夫妇和国民政府高层私交甚密。第10、第11册的主题分别是“蒋介石、宋美龄相关书信与文稿”和“费吴生夫妇与名人往来书信、影像”。除与蒋氏夫妇的往来书信外，还有费氏夫妇与美国政要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杜鲁门(Harry S. Truman)、尼克松(Richard Nixon)、赫尔(Cordell Hull)、史汀生(Henry Stimson)、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等，中国名人周恩来、宋子文、孔祥熙、王正廷、胡适等，朝鲜半岛政要名人李承晚、金奎植、金九等的往来书信。第17-20册收录的英文出版物大多刊行于20世纪30、40年代，包括《战时中国》(China at War)、《西方人眼中的战时中国》(Wartime China: As Seen by Westerners)、《美亚》(Amerasia)杂志、《中国月刊》(英文)(The China Monthly)等数十种。

第三编为“社会团体编”，共9册。费氏夫妇参加了诸多近代中外社会团体，该编收录的文献即与此有关。费吴生曾担任上海外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战时军人服务团战地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西北区域干事等职务，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他也是许多民间组织和团体的骨干成员，曾担任上海共济会会长、上海扶

轮社主席等职务。第21-23、第24-25、第28、第29册的主题分别为“基督教青年会”“盲童学校”“扶轮社”“共济会”。“基督教青年会”的资料主要有费氏夫妇往来书信、宣传册、新闻报道、演讲稿、文章等。“盲童学校”的资料主要有费氏夫妇往来书信、备忘录、工作报告等。“扶轮社”“共济会”的资料主要有费氏夫妇往来书信和出版物等。

费吴生夫人出生于美国，曾加入美国卫理公会的青年人协会——务德会(Epworth League)，从事青年团契活动，来华后曾在南京华言学堂学习。第26、第27册收录了费吴生夫人在这两个组织中的文稿、书信、旅行日志，以及杂志等文献。

第四编为“个人文献编”，共11册，分为五个主题。第30册主题为“费吴生家庭财产”，收录了费吴生家族遗产、在华财产受损与诉讼、家庭投资等资料。第31册主题为“费吴生日记”，收录了1944-1949年间费吴生在中国、美国和韩国等地的日记，以及他收集的记账簿、记事簿、收条等资料。第32-35册主题为“费吴生夫妇文稿”。费氏夫妇一生留下了大量手稿，尤其是费吴生夫人，是有名的记者、作家、演说家。该主题收录了费氏夫妇的书稿、评论文稿、访谈稿，尤其是费吴生夫人的文稿。第36-39册主题为“费吴生夫妇与友人通信”，收录的是他们1918-1950年的通信。第40册主题为“费吴生夫妇在华游记与收集图片”，收录了费吴生在华游历资料，以及费氏夫妇收集的有关中国的历史图片。

如前所述，费吴生是著名的秘密组织共济会的骨干成员。共济会(Free and Accepted Masons)又称“美生会”，起源于英国，清代传入中国，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上海、宁波、厦门等地建立会所，逐渐成为中国各界人士隐秘的联谊纽带。历史上，美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等人都曾加入共济会，王宠惠、王正廷、蒋纬国、宋子良、梅华铨、牛

惠霖、徐文炯、谢伟思(John S.Service)等著名人物则是中国共济会会员。诸多政治、商业、文化、宗教界人士加入共济会,使共济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费吴生是共济会在华活动的关键人物,曾担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共济会会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费吴生长期担任台湾共济会总会长,一度成为台湾地区“中国美生总会”总会长。

《档案汇编》第29册收录了数百件有关共济会的文献史料,包括各地共济会的组织、活动资料,共济会成员之间的往来书信,费氏夫妇收藏的相关文稿、文书、出版物等,对于梳理20世纪中国共济会的组织演变和在华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费吴生为华人共济会会员李元信曾做过个人传记《李元信小传》(A Brief Biographical Sketch of Yinson Lee),李元信本人亦写过一篇题为《共济会成立六十周年记》的文章,这两份史料披露了中国共济会友谊会所成立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历程。^⑤李元信既是中国共济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海外华人帮会义兴会的骨干,义兴会即今日海外洪门主流派系致公堂的前身。可以说,由于共济会成员的复杂性和活动的隐秘性,其与中国近代史关系匪浅,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近代社会的切入点。《档案汇编》收录的有关共济会的丰富史料,对于研究这一尚未受到广泛关注的领域大有帮助。

费吴生是近代在华外国传教士的典型代表之一,目前学术界有关在华传教士的研究,较多关注传教士在宗教、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领域的活动及影响,鲜少关注传教士群体自身生活实态。在华传教士的收入来源?生活水平如何?在中国有无投资活动?生活状况对其在华活动有无影响?以及传教士的经济状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均有重要价值,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档案汇编》收录的相关文献史

料,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档案汇编》第30册“费吴生家庭财产”详细记载了费吴生及其家族的经济状况。其中第三部分主题为“费吴生家庭财产及其投资”,该主题档案史料以书信和财产文书为主,前者主要是费吴生夫妇与上海美华地产公司、群益行、汇丰银行、中国银行等机构以及投资经理、法务人员之间的通信,围绕家庭投资问题展开;后者是费吴生家庭储蓄账户、投资清单、租赁合同、退休津贴、银行信托清单、基金捐献表、财产遗嘱等。这些私密性档案极强的史料为研究者从私人经济角度探索近代在华传教士群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较好地帮助学界理解在华传教士的生活来源、经济状况,以及经济状况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关系。第二部分主题为“在华财产受损及索赔诉讼”,一方面记录了费吴生就抗战期间在华财产损失和索赔事项与美国驻南京大使、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美国驻重庆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等机构和个人之间的沟通过程,另一方面呈现了费吴生战时在华财产损失和索赔诉讼的细节。其中1938年10月的财产损失陈述中,详细披露了费吴生在南京保泰街住所和上海虹桥路房产遭日军破坏、掠夺的情形,特别是南京沦陷后日军多次非法闯入和抢劫费吴生保泰街住所的细节,其附录中则开列了具体损失清单。^⑥这些难得一见的档案史料既有助于理解传教士在华财产问题,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侵华日军的侵略破坏情形。

新视角:《档案汇编》的编纂特色

就史料本身而言,费吴生夫妇档案的显著特点是数量庞大、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且绝大部分为英文档案。这些特点对姜良芹教授领衔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整理编纂课题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又要有相当熟练的文献编纂能力,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史料的编纂并非简单地归纳分

类,而是一项繁琐、浩大的整理编辑工程,必须经过细致的甄别和考辨。姜良芹教授课题组2014年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达成合作整理协议,至2022年《档案汇编》付梓面世,历经八年之久,课题组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通览《档案汇编》,可以发现这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题广泛而明确,内容丰富而清晰。据悉,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费氏夫妇档案共57箱,总量逾6万页,不可谓不多。对于这些档案,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原始分类、编号较为粗糙,每箱档案的原始名称难以涵盖各箱所涉及的全部内容。课题组成员不辞劳苦,在此基础上对所有档案进行了二次整理,根据档案具体内容凝练出主题,以便能准确地突出相关文件的史料价值。例如第12、13册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该主题史料数量不少,且散落于各个箱子,课题组成员没有拘泥于各箱原始主题,在第11、18、23、25、30、31、32、41、49、50等箱中认真挑选相关档案史料,辑录成册,以方便读者利用。《档案汇编》共凝练出23个主题,总量近2万页,涵盖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宗教、教育、社会救济、秘密社团等诸多领域,既生动体现了费氏夫妇人生的漫长与复杂,又突显了档案极高的史料价值。

揆诸《档案汇编》收录的档案史料,有明确时间者,最早为1918年,最晚为1977年,前后跨越60年,可以说这些档案史料记录了从民国初年到“冷战”的历史。令人欣喜的是,虽然主题繁多,但是《档案汇编》史料线索清晰,结构完整,许多档案文献虽然来自不同的档案箱,却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各个主题的大致轮廓。

第二,《档案汇编》档案史料种类丰富、编排得当。丛书在保持档案原貌的基础上,根据每一份档案的具体内容和特点,依据档案史料的性质和门类,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并汇编成册。笔者对全

书作了初步统计,《档案汇编》收录的档案史料种类主要有往来书信、电报、日记、未刊手稿、已刊文章和评论、报纸(含剪报)、期刊、工作报告、备忘录、访谈资料、图书、画册、历史图片、票据、账簿等,其中绝大部分未曾刊布。

在各主题之下,编纂者首先按种类对档案史料进行分类,每一类型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没明确时间或难以考证具体时间的,则置于每一类型档案史料的最后。如第2、第3册“南京大屠杀”,收录的档案史料按照书信、日记、战后诉讼文件、剪报、文稿进行分类,在书信之下,又细分为费吴生书信、费吴生夫人书信和他人书信,文稿分为费吴生文稿和费吴生夫人文稿,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第7册“战时美国民间援华”,编者首先对美国民间援华机构进行分类,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性质特殊,资料较多,故单独列出,其他援华机构如美国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等归为一类,不同机构下,再对档案史料进行细分。第9册“战后美国有关亚太局势与中国问题的文献”,这一主题档案史料较为庞杂,难以提炼出二级主题,编者按刊物、情报、报告、文章、演讲、评论等进行分类,同一类型档案依照时间顺序编排,对于无法归入以上类型中的档案,则命名为“杂项”,置于全书最末。虽然丛书内容繁多,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读者查阅一目了然。

第三,编纂体例适宜,特点鲜明。全书共23个主题,每一主题均有“编辑说明”,对编纂体例、档案史料分类和形成经过,以及史料价值进行说明。如第17-20册收录了许多抗战时期的英文出版物,编者在说明中指出,战时英文出版物的收录标准有三:“其一是战时出版,即出版时间在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之间,内容与中国相关。其二是战后出版,但内容与战时中国密切相关。其三是装订成册的出版物,零星的杂志散页、剪报等不在收录范围。”^⑦各册还对所收录的期刊《战时中

国》《美亚》《中国月刊》(英文)及图书《西方人眼中的战时中国》的由来、出版发行情况,以及所收录的杂志、图书主要内容做了简要介绍。

与其他英文影印档案史料不同,《档案汇编》各册还根据具体情况对史料作初步考证。第32册主题是“费吴生夫妇文稿”,第一部分收录了费吴生夫人的著作《中华大地》(On China's Soil),该书批判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编者除在说明中介绍了著作的主要内容、具体观点、缺失章节等,还初步考证了写作时间,认为“结合文稿内容,尚可判断此手稿形成于1931年之后,而成稿时间可能比较漫长,因在书稿的第十二章、十七章均提及1937-1938年日军侵略之史实”^⑧。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帮助读者迅速了解各册档案史料的重要信息,增强了《档案汇编》的可利用性。

第四,整理编纂时尊重档案史料本身,最大限度保持原貌。如第1册第一部分收录了费吴生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日记,日记底稿已经遗失,目前保存下来的共四个版本,即费氏向政府、民间机构展示日军侵略暴行或向报社等投稿时的整理版。由于在不同场合展示的需要,费吴生对日记细节进行了改动,日记结束时间也不尽相同,但整体内容基本未变。其中,版本一收录了1932年1月28日至4月10日的日记;版本二收录了1932年1月28日至4月11日的日记;版本三收录了1932年1月28日至3月7日的日记;版本四收录了1932年1月28日至2月27日的日记。为了方便读者对比利用,编者将日记的四个版本一并编排,使读者能够完整看清日记的原貌和具体不同之处。

第10册第二部分收录了费吴生夫人介绍蒋介石和宋美龄文章的草稿,该部分分三个专题,专题一为“费吴生夫人笔下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下分六组,第一组文章草稿八份,中文译名均为《中国第一夫人》,但内容不完全相同。其中第一、第

二份草稿为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英文标题为“China's First Lady”。第三、第四份草稿也为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英文标题为“China's First Lady of the Land”。第五、第六、第七份草稿的英文标题相同,均为“First Lady of China”,但内容完全不同。第八份草稿为零散的活页笔记。编者将八份草稿一并收入,按先后顺序编列,以便读者查阅。之所以如此,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档案史料的原貌,供读者自行考辨。此外,《档案汇编》对于个别难以考证的人名、机构名称、出版物名称,均保留英文原名,未翻译,以保持档案史料的原貌。

可以说,《档案汇编》在继承、发展既有海外藏档编纂体例和特色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一方面对今后探索中外合作编纂档案文献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另一方面也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第2册第二部分收录了三份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原始档案。第一份是生活在南京的美国侨民1937年9月间的日记;第二份为金陵大学医院于1937年底接收的34例日机轰炸暴行受害者的记录;第三份为留在南京的基督徒布道团成员麦卡伦(J.H. McCallum)牧师1937年12月19日至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三份档案主题相近,故按顺序编排在一起。南京沦陷后,麦卡伦作为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管理人员留在南京,他于1937年12月19日至1938年1月15日期间致家人的日记、信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曾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1995年,在上海市档案馆发现了麦卡伦日记的副本,但不完整,2005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补充收录了麦卡伦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此次《档案汇编》收录的麦卡伦日记为英文稿,其首页标有“非公开出版”,具体内容和既有日记中译本不完全相同。经比对两份日记,发现中译本有1937年12月19日、29日、30日、31日和1938年1月1日、3

日、4日、5日、6日、9日、11日、12日、13日、15日的日记,共14天;英文本有1937年12月19日、29日、30日、31日和1938年1月1日、3日、5日、6日、7日、9日、11日、12日、13日、15日,共14天。英文本缺1月4日日记,而英文本1月3日日记的最后两段,正是中译本1月4日的日记,但英文本比中译本缺少一段文字:“我不知道该怎样将信寄给你。你上一封信的日期是11月25日。我头脑中浮现的情景是,你们一群人在学校里和孩子们在雪中玩耍嬉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⑨笔者初步判断是,英文本日记可能写于1月3日,但在4日作为书信的内容寄给了家人,故加了上述问候家人的文字。英文本还有两篇1月6日的日记,其中第一篇6日的日记在中译本中为1月5日,第二篇6日和7日的日记在中译本中则为1月6日。不仅如此,日记文本内容也不完全一致,相较于中译本,第一篇英文6日的日记多了一段文字:“我们从东京、马尼拉和上海收到一些英文报告,也有一些不错的音乐,但是我昨天花了几个小时听收音机,所有的频道都能听到同样的唱片,以至于我都可以给家人们唱出来:‘我是大力水手,我是大力水手,我要战斗到底,因为我吃了菠菜,我是大力水手’。”^⑩此类现象在麦卡伦日记中还有不少,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比对,或可补正历史细节。

《档案汇编》的学术价值和利用路径

史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犹如根与叶,搜集整理史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学术研究。费吴生夫妇因漫长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形成了这批重要档案,具有数量庞大、主题丰富的特点。《档案汇编》所呈现的众多主题,一方面有利于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弥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薄弱乃至缺失环节,这决定了《档案汇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档案汇编》有利于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领域。费吴生常年在华工作生活,经历

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经历为《档案汇编》丰富的主题奠定了基础。1932年4月,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金九、安重根、尹奉吉等策划了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此次行动中,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受重伤。案发后,费吴生夫妇将金九、安重根、金澈和严恒燮四人藏匿于自己家中近一个月,后掩护他们转移至浙江嘉兴。此后,费氏夫妇一直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保持往来,并采取各种方式支持他们的活动。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朝鲜“三一”运动、东北地区韩人独立活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内韩人武装、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以及韩侨、宣传和相互认知等领域。^⑪也有学者指出,韩国独立运动应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史中研究。韩国开展反日独立斗争的同时,许多人背井离乡到中国、日本、苏联、美国、欧洲开展斗争,从而决定了韩国独立运动及其史料的多元性,然而目前对域外史料搜集整理重视还不够。^⑫《档案汇编》第16册收录了1938—1952年的朝鲜半岛史料,其中不乏与韩国独立运动相关的书信、电报。如1942年8月,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韩国人士在获得韩美理事会正式任命后,致信费吴生夫人,感谢她长期以来为韩国独立运动所付出的努力。^⑬再如1945年5月14日,韩美理事会致函美国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Owen Brewster)、沃尔特·F.乔治(Walter F. George)等人,称得悉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朝鲜半岛问题达成秘密协议,美国同意苏联托管朝鲜半岛。对此,在美韩国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与承诺朝鲜半岛独立自由的《开罗宣言》相悖,也将阻止韩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并表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已得到中国和法国政府的承认,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任何有损韩国独立的安排。^⑭这些档案史料呈现了韩国人士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细节,有助于推动

海外韩国独立运动的研究。

《档案汇编》对于进一步拓展战时中美关系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学术界有关战时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美两国政府层面的往来,而对中美民间交往,特别是对美国民间援华组织的研究较少。以第7册“战时美国民间援华”为例,该册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援华档案文献,包括书信、报告、演讲资料等。书信以费吴生夫人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成员之间关于募捐的通信为主;报告以费吴生夫人的募捐报告为主,另有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工作报告及工作计划。第二部分主要是美国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美国教会对华救济会的相关档案文献,反映了当时美国民间在医疗救助、妇女儿童救助、战地服务、物资援助等方面的努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与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不同,美国民间人士和旅美华人华侨成立了许多援华组织,为中国抗战积极奔走。为了统一美国各地援华募捐活动和提供援华经费,1941年2月,由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等牵头,发起成立了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参与该联合会的团体有:美国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美国教会对华救济会、美国公谊服务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美国对华紧急救援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Relief Committee)、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ese War Orphans)、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Indusco Inc.)。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可以说是战时中美民间交往的典型代表,其通过何种方式援助中国,经费募集、分配情形如何,受史料限制,国内学术界对此语焉不详。而第7册收录的《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五年工作报告》明确解答了上述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华援助,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重庆设立驻华办事处,由美国基督

教青年会总干事艾德敷(Dwight Edwards)担任主任。办事处工作人员定期实地调查,报告援助请求,将请求提交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下设的技术小组委员会(包括救济和康复、儿童福利、教育和医疗等),再由技术小组委员会提交由中美人士共同组成的综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再将报告提交纽约的工作委员会审查,最终将报告提交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董事会。报告得到审批后,资金从纽约迅速汇给在华负责各种项目的救济人员。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自1941年2月成立至1945年,累计募集经费40655711.2美元,寄往中国的经费为36277940.8美元,这些经费大致分为救济和康复、儿童福利、医学与健康、教育等几类。^⑤总之,第7册收录的档案史料为进一步探讨战时中美民间交往提供了新的线索。

其次,《档案汇编》对于弥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薄弱乃至缺失环节具有重要价值。费吴生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事件,所形成的档案文献对于进一步厘清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具有重要价值。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费吴生人生中一段特殊的经历。当时费吴生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也是上海扶轮社的核心成员,扶轮社是著名的跨国联谊组织,成员多为工商界精英,自北美传入中国后主要从事社会救济活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费吴生以上海扶轮社的名义与日本扶轮社进行交涉,希望通过扶轮社这一跨国组织来化解中日矛盾,同时,费吴生还参与了扶轮社对上海难民的救助。费吴生在事变期间的日记,记录了他和日商船津辰一郎、英商哈里斯(E. F. Harris)等人,通过扶轮社,发起呼吁制止战争的请愿活动。日记还详细记录了扶轮社成员如何与中国方面及日本领事建立联系,参与请愿活动的外商具体立场如何,以及请愿活动结束的过程。^⑥上海扶轮社在事变前后活动的档案史料,对于学界从民间视角特别是跨国商人团体的角度了

解中日战争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显然颇有价值。时至今日,扶轮社依旧是闻名世界的跨国商人团体。《档案汇编》第28册刊布的扶轮社档案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扶轮社乃至全球扶轮社的重要史料。

抗战时期费吴生在华兼任多职,其中一个特殊职务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执行顾问。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1938年在中外人士共同努力下发起的经济自救运动,主要通过组织工业合作社,从事军需民用物资的生产。多年来,费吴生与“工合”运动的关系甚少引起学界关注,仅有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所涉及。第12、第13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收录的档案史料勾勒出费吴生与“工合”运动关系的轮廓。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战时“工合”协会先后进行了五次改组,与费吴生直接相关的有三次,这三次改组深刻地影响了“工合”运动的走向。1941年5月,由于第一次改组效果不佳,“工合”协会又进行了第二次改组,在刘易斯·史迈士(Lewis Smythe)等人的推荐下,主持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费吴生担任“工合”协会的执行顾问。事实上,费吴生并不愿意中途接手“工合”工作,由于没有相关经验,费吴生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一职位”。^⑥而这一点确实影响了费吴生的工作成效。费吴生上任后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二是为“工合”协会争取更多经费。由于国民政府不愿意为“工合”增拨经费,费吴生提出将海外募集的经费交由“工合”协会分配,遭到以路易·艾黎(Rewi Alley)为首的实地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费吴生对此十分不满,指责艾黎等人不愿意放弃海外经费控制权是“慈善帝国主义”行为。^⑦因此,费吴生支持“工合”协会第三次改组,邀请周象贤担任总干事,积极争夺经费分配权,并进行人事调整,同时,他还邀请美国合作专家麦肯齐·史蒂文斯(Mackenzie Stevens)来华。在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的支持下,费吴生等人一

度接近成功,后遭到“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的反对,加上麦肯齐·史蒂文斯也不支持“工合”协会加强上层控制权,费吴生等人最终未能达成目的。1943年6月,根据麦肯齐·史蒂文斯建议,“工合”协会第四次改组。由于经费常年紧张和运动路线变动不定,导致“工合”运动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可以说费吴生与“工合”运动的走向关系密切。

类似的例子在《档案汇编》中俯拾即是,由于这些档案文献涉及近代中国的诸多领域,研究者如能善加利用,当能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当然,《档案汇编》也并非毫无可议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美中不足”。

第一,费吴生夫妇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仍有待继续开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氏夫妇档案逾6万页,而《档案汇编》仅收录了近2万页,虽然数量庞大,但仍不到馆藏体量的一半。费氏夫妇人生经历漫长而丰富,剩下的4万多页档案文献必定还有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课题组是按文件的具体内容先作主题“提炼”,难免存在以偏概全现象,那些数量上无法单独成册出版的档案史料,“不幸”成为遗珠,多少有些遗憾。考虑到英文档案编纂的难度,以及时间、经费的限制,费吴生夫妇档案剩余部分的挖掘整理工作,是继续“二次凝练”主题后出版,还是按照其他逻辑(时间顺序、史料种类)来整理出版,都值得课题组思考。

第二,《档案汇编》中不同主题由不同编者各自完成,在选择、收录档案文献时,不免存在重复现象,如第13册、第37册就重复收录了费吴生1943年的书信。类似现象在其他册中也有一些。

第三,《档案汇编》收录了大量第一手档案文献,但学者在参考引用时亦须注意,不可过度依赖单一史料。对于具体的研究选题,仍要充分搜集、比对不同史料,综合研究。如第4册收录了《美亚》杂志、《中国月刊》(英文),并不是连续完整的,一部分是费吴生夫妇收集的与战时中国相关的期

刊,另一部分是刊登有费氏夫妇文章和消息的期刊。如果要全面了解这些英文报刊对中国抗战的报道,仅靠《档案汇编》中的部分刊物是不够的。第12册收录的“工合”英文报纸也不完整,其中《“工合”新闻》(Indusco News)只有1940年1、3、4月和1941年3、5、6月的报纸。有关“工合”的英文报纸较为罕见,而收录不全,使得该册史料价值不免打了折扣。

虽然有个别缺憾,但瑕不掩瑜,《档案汇编》主题丰富、档案文献完备、内容系统,是海外档案文献整理的一大突破,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诸多领域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为国内学界与海外合作编纂档案史料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功莫大焉。

注释:

①姜良芹、郭洋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全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②姜良芹、曾磊磊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解放区档案》全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③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全4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④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前言”,第13页。

⑤李元信:《共济会成立六十周年记》、费吴生:《李元信小传》,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29册,第473、474-482页。

⑥《费吴生南京、上海有关损失陈述》(1938年10月),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30册,第97-105页。

⑦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7册,第2页。

⑧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32册,第2页。

⑨麦卡伦:《致家人函》(1937年12月19日——1938年1月15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11页。

⑩《J.H.麦卡伦(J. H. McCallum)日记》(1937年12月19日——1938年1月15日),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2册,第236页。

⑪王建宏:《中国学界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1992-2021)》,《当代韩国》2022年第3期。

⑫孙科志:《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安徽史学》2019年第5期。

⑬《韩国朋友致费吴生夫人》(1942年8月),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6册,第13页。

⑭《韩美理事会致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Owen Brewster)、参议员沃尔特·F.乔治、代表克莱尔·E.霍夫曼(Clar E. Hoffman)函》(1945年5月14日),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6册,第35页。

⑮《美国援华联合会五年工作报告》,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7册,第273-275页。

⑯《费吴生战时日记(一)》版本一(1932年1月28日至4月10日)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7-48页。

⑰《费吴生1941年度工作报告(Administrative Report of G. A. Fitch for 1941)》(1942年6月27日),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3册,第121页。

⑱《费吴生致编辑》(1942年10月21日),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3册,第25-26页。